

韩·中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的比较研究

- 以韩·中高中中学生为例 -

陆潭晟*

<目 录>

1. 引言
2. 理论背景及先行研究考察
3. 研究方法
4. 分析结果及论旨
5. 结论及展望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影响的增大,商品及人口移动的不断增长,多种文化相互交杂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世界各国中的多元文化现象更是日益彰显¹⁾。在这样的世界性浪潮中,中国与韩国自然也无法例外。韩国的外国人流入现象起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国内市场的开放和部分产业内部劳动力的不足,韩国正迅速地转变为多元文化社会国家。韩国国内的滞留外国人数也由1990年的49,507名剧增至2013年的1,576,034名,同期所占总人口比重也由0.11%升至3.21%(통계청, 2014),并且可以预测该数值将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²⁾。

* 岭南大学校 社会学科 博士修了 / 东亚细亚文化学科 博士课程 E-mail : china@ynu.ac.kr

1) 据UNDESA(2009)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全球69亿人口中约2亿1千万人(3.1%)居住于非出身国,另外,相比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年平均移民人口增加值(1.4%),21世纪初期10年间的年平均移民人口增加值(1.8%)已经大大增加(김희재, 김현승, 2012 : 88)。

2) 根据成均馆大学Hybrid Culture向企划财政部提交的“2040年韩国生活质量”最终报告书,为

中国的外国人流入现象与韩国不同，由于中国初期国内劳动力充足，不但国内海外人力为数不多，甚至本国劳动力输出量也在与其他国家相较之中跻身前十(IMO, 2012: 68)。直至开放政策出台之后，海外资本与高新技术不断引入中国，与此同时，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加。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极为可观的一面之后，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识也随之巨大扭转，直接促使中国国内的海外人员大量增幅。以2007年为基准，全世界前500强跨国企业中就有480个企业正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与这些企业具有直接·间接关系并在中国国内长·短期居住的外国人数达到200万名以上(육담성, 정용교, 2014: 309)。

如此看来虽然中·韩两国的外国人流入形态完全不同，但是由于受到全球化影响而导致的外国人流入激增，两国所面临的多元文化现象是一致的。为了良好地面对这一现象，两国政府开设了相应的国家政策与法律措施，但尽管如此也难有成效，原因为国家方面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在于国内主流群体的多元文化受用性(acceptance of multiculturalism)程度的高低(김희재, 김현숙, 2012: 84)。另外，这样的多元文化受用性也与国内主流群体的国民认同感(national identity)有着紧密的关联。其原因为国民认同感作为社会认同感中基本形态的一种，完全可以成为衡量多元文化受用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Tajfel & Turner, 1986: 7-24)。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日益浮上的多元文化现象，针对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相关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韩两国有关外国人流入有着相似的经历，加之双方今后国内外国人数的持续增加几乎已成既定事实，由此可以断定两国未来的社会形态将比当下更具多元化因素(김현숙 외, 2011: 142)。但犹如硬币有两面一般，相似之处存在的同时，相异之处自然也会出现，故对两国间的比较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

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众多的海外劳动者们将持续流入，从而导致韩国社会的外国人数不断增加，甚至可以预测在韩外国人数将在2020年达到200万人，2030年达到400万人，2040年达到700万人(기획재정부, 2011: 155-156)。该报告书也同时预测韩国总人口数在2040年将达到4500万人，故截止2040年，外国人所占韩国国内总人口比重将达到15.6%。

是针对高中学生的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进行观察,既能为今后多元化性的中等教育开辟先机,亦能为预测未来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面貌提供新的帮助,甚至于将为今后展开多元文化社会战略提供有效参照。

鉴于此,本研究以中·韩高中学生为中心,重点针对两国学生的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为了达到该目的,首先需要了解两国学生的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是如何产生,其次将对两者间的关系与两国学生在该方面的差异进行观察研究。

2. 理论背景及先行研究考察

2.1 国民认同感

国民认同感指国家构成员对“作为国民的地位(nationhood)”的认识,也能看作是约束自身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中的一种(Brubaker, 1992: 13-14)。即,作为国家构成员所具有的感情和态度可视为国民认同感的特性。此外,国民认同感在不同的国家中都具有其独特的发展方式,理由为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时期与过程,以及构成员们对国民(民族)的自我理解都是随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

一般来说,国民认同感可以大致分为以种族·血统为中心及以公民意识为中心两种形态。以种族·血统为中心的国民认同感指将国家(政治共同体)与民族(血缘·文化共同体)以等量齐观的方式来对“国民”进行理解,代表性的国家有中国、韩国、日本等,这些国家中的构成员们往往已经形成了具有强烈集体共同性和同质性的国民认同感。而以公民意识为中心的国民认同感则指排开民族(血缘·文化共同体),强调以政治目的的方式来对“国家(政治共同体)”进行理解,代表性的国家有美国、英国、德国等大多数强调平等性、统一性或是本身就存在多种

民族共存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中的构成员们往往重视政治·公民权力，强调平等性与同一性(육담성, 2014 : 311)³⁾。

2.1.1 韩国的国民认同感

虽然现如今将韩半岛全体居民都视为韩民族的认知观已大不如前(권혁범, 2009 : 16-18)，但由于长期生活于同一地区，受地域限制与历史影响所形成的民族种族单纯性与政治·文化认同感造就了近代韩国以种族·血统为中心的国民认同感。韩国在1945年解放后，开始接纳西方的近代秩序体系，至1948年制定的大韩民国提呈宪法中，将父系血缘主义、属人主义、单一国籍主义定义为规定国民身份的核心条件，即在父亲为韩国人并且在韩国出生者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韩国人。虽然在1998年修订的国籍法中将父系血缘改为两系血缘，但提呈宪法中所规定的国民条件被继续保留了下去(김현숙 외, 2011 : 145)。另外，1997年以后制定的在外同胞关联法再一次强调了韩民族的血统主义(김현진, 2006 : 84-85)。

不过与这些法律体系不同的是，近来对韩国国民认同感进行分析的研究中，相较于以血统·种族为中心的态度，主张韩国人以公民·政治为中心的态度更为鲜明。例如先行研究中就指出，“成为一名真正的韩国人的标准，相较于出生和血统，法律意义上的国籍与韩国语的使用更为重要(강원택, 2006 : 21-22)”；“韩国的国民认同感与国际调查的结果相比较，其血统主义的一面并非过于强势(최현, 2007 : 157-158)”；“由关于韩国人国民认同感的应答中可以看出，相较于种族因素，公民因素更被重视(윤인진 외, 2010 : 134-135)”。

通过上述先行研究可以觉察到，韩国的国民认同感正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之

3) 将国民认同感一分为二的学者并不少见，如Brubaker(1992)便将国民认同感分为血缘文化型与政治目的型；而Jones & Smith(2001)与Smith(1991 ; 1995)也将国民认同感分成了种族·血统型(ethnic-genealogical model)和公民·领土型(civic-territorial model)等两种。前者具有以所得地位来强调国民地位与属人主义(personal principle)的排他性的立场，而后者则强调以属地主义(territorial principle)与对律法·规则的遵守来衡量国民的成就与地位，相对来说后者更具有较强的包容性(황정미, 2010 : 159)。

中，特别是针对于由单一民族意识所产生的以种族·血统为中心的国民认同感。加之受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与流动性的增强所产生的周边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对韩国人的认同感意识造成了影响。

2.1.2 中国的国民认同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⁴⁾。历史上由于汉族领土的不断扩展，异民族(少数民族)的不断融入，浑然天成地造就了中国的种族与文化的多样性(최현, 2003: 150)。之所以称其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是由新中国成立之前受到的长期性·持续性的统治所造就的。近代中国之前的历朝历代间，以汉族为中心不断地从周边地区吸纳少数民族(박병기, 2007: 197)，直至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仍然在该点上不懈努力，故可以看出作为国家而言的当代中国发展了强调以政治共同体为中心的国民认同感。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国之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中提出，无论所在地区，只要一心归化都能取得中国国籍，另外，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的情况下，都能赋予其子女中国国籍。这样的法律制度同样适用于国内的少数民族。同时“宪法”还明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⁵⁾。而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中也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合法自治权提供保护，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손영기, 이정향, 2013: 464)。

此外，于9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带动了新政策的转换，多元一体化教育就是最好的例子。其核心内容在于不只是单方面强调汉族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而是开创一种新的中华民族文化。即，中国各个民族在掌握本族文化

4) 现今中国由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所构成，其中少数民族总人口约为1亿，并广泛居住于各个自治地区，居住地的总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64%，此为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所掌握的最新客观事实(조경란, 2006: 78)。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四条。

的同时，也将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强调了民族文化的共存性。换句话说，中国的多元一体化教育在尊重少数民族多种文化的同时，也强调了各个民族实为一体的教育方针。通过这种政策转换所强调的国家内部一体性来看，中国的国民认同感正在向着以强化种族·血统为重心的道路上前行(김현숙 외, 2011 : 147)。

2.2 多元文化受用性

所谓多元文化受用性可以理解为社会构成员们对随多元文化社会的到来而出现的具有不同人种·文化背景群体的接纳性。作为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中衍生出的多元文化受用性，不以本国文化为对错标准，而是认同并尊重多种文化、与外国移住民同生共存的多元化指向性态度。简单来说，多元文化受用性可由对多元文化社会转变的态度与对移住民的接纳程度来衡量(육담성, 2014 : 312)。

多元文化受用性与社会主流群体对外部群体即外国移住民的认知性威胁程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原因为随着社会主流群体不安感的加深，其多元文化受用性也将不断降低。社会主流群体对外国移住民产生的威胁意识以权力、资源、利益、报偿等方面为主，该意识也大大增加了两者集团间发生竞争与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另外，这种威胁意识也与人种主义、权威主义、保守主义、偏见主义相衔接，并由对外国移住民的排斥与不宽容性的态度、差别、偏见所决定。由此看来，社会主流群体的不安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Scheepers, et al., 2002 : 29 ; Pettigrew, 2003 : 74)。

社会心理学者们以竞争的本源为基准，将威胁意识分为外在性威胁(external threat)与认知性威胁(perceived threat)两种(윤인진 외, 2011 : 155)。其中，外在性威胁作为实质性的一面常见于本国国民与外国移住民对就业机会的争夺上。而认知性威胁则是虽然不与外国移住民进行直接竞争，但对于眼前的茫然与不确定性感到恐慌的心理行为(Raijman & Semyonov, 2004 : 794-795)。

一般测定多元文化受用性时最常用的尺度为种族排斥主义(ethnic exclusionism)尺度⁶⁾和社会距离感(social distance)尺度。其中种族排斥主义是为了针对欧盟成员国中在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的国家进行分析⁷⁾而设定的概念,该尺度同样也适用于本次对中·韩两国多元文化受用性的比较研究⁸⁾。

2.3 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间的关系

关于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间关系的研究为数不多,不过随着近来全球多元文化现象的不断升温、各国针对多元文化受用性的问题提及则越发频繁,与国民认同感相关联的多元文化受用性研究也在逐渐递增。首先对国外的研究进行考察。Jones及其同僚使用1995年国际社会调查(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中有关国民认同感的模块进行研究并得出,相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具有更为开放以及包容性的国民认同感,故提出多元文化受用性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Jones&Smith, 2001: 112)。此外Simin及其同僚对西方7个国家的国民认同感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国民认同感较强的人相对于外国移民的流入会产生更多的混乱意识,从而导致该类人群对多元文化产生否定的态度(Simon&Lynch, 1999: 464-465)。还有,在综合比利时学者

6) 欧洲人种差别监测中心(EUMC)将种族排斥主义定义为对具有一个或多个民族·人种的外来群体持有的一般化非友好性的态度(generalized unfavourable opinions on one or more different ethnic out-groups)(황정미 외, 2007: 143)。

7) 欧洲人种差别监测中心(EUMC)使用种族排斥主义的尺度来掌握社会主流群体对外国移民的态度,而种族排斥主义尺度则由对合法外国移民进行遣返的政策、对外国移民者的抵制、认知性威胁与侵入等几项构成(EUMC, 2006)。EUMC通过同样的问卷对欧洲15个国家进行调查并对能够影响种族排斥主义的个人因素和国家因素进行分析,个人因素中发现,个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从事体力劳动、经济水平较低或失业者,其种族排斥意识相对较强。对此可以解释为该类群体认为外国移民的流入会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造成不安全因素,并在条件对比且自身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产生差别感。另外从国家因素中发现,人均GDP相对较低、失业率较高、本国人口中非欧洲国家移民比率较多的国家,其种族排斥主义更为明显。

8) 种族排斥主义实为在统合的次元之中,对自身所属的民族·人种群体加以强烈的同一性态度,而对外来群体加以排斥性态度的社会认同感(social identity)的机制,该机制在外在性威胁与认知性威胁的影响之下更为强势(윤인진 외, 2011: 157)。

Flemish与Wallonia对国民认同感的研究及Maddens等学者(2000 : 57)对外国人态度的研究后可以发现, 国民认同感的程度受地区因素的影响, 故其对多元文化受用性亦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其次对韩国国内的研究进行考察。某学者使用韩国女性政策研究于2007年实施的“韩国社会多民族多元文化指向性调查”进行研究后得出, 单一民族的强烈自尊心不仅会强化国民对多元文化产生的威胁意识, 还会削弱国民对外国移住民的平等对待和价值认定的态度(황정미, 2010 : 179)。另外, 把对国民认同感的认知分为四种类型的某韩国学者提出公民型国民(相比于种族认同感, 此处为具有较强公民认同感的民众)对合法外来劳动者持有非常宽容的态度(윤인진 외, 2011 : 172)。亦有学者通过观察韩国青少年的国民认同感对其多元文化受用性的影响后得出, 种族认同感在对自民族指向性产生正面影响的同时, 亦会对多元文化指向性产生负面的作用(김경은, 2012 : 135)。

经以上先行研究考察后可以发现, 在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的关系中, 公民认同感意识与多元文化受用性呈正相关, 而种族认同感意识与多元文化受用性呈负相关, 当然在一些先行研究中并未将国民认同感区分为这两个类型, 在此且不赘述。另在某些将国民认同感分为种族与公民两类并对其与多元文化受用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先行研究中提出, 国民认同感的影响力并非很大, 故对其下位因素的关系进行再次验证就显得颇为必要。基于此点, 本研究且对中·韩两国的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间的关系展开观察与分析。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为2013年3月-5月由韩国岭南大学社会学科所实施的“中·韩高中学生多元文化受用性”调查资料。该调查意在对中·韩高中学生的国民

认同感、多元文化受用性乃至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差异进行验证。具体操作如下, 结合比较研究所需标本的代表性、调查范围、调查期间以及经费等因素, 在对调查对象(即中国江苏省所在的4所高级中学与韩国大邱庆北地区所在的7所高级中学)的选定之后⁹⁾, 考虑到不同性别和年级等人口社会学特性的情况, 首先就调查对象的比例进行分配, 使用分层随机标本抽出法进行标本取样后, 以委托式的方式由学校负责人展开设问调查, 两国各分发300份调查问卷, 共回收问卷575份(中国: 291份, 韩国: 284份), 回收率为95.8%。在剔除非合理性无应答、不诚实应答和缺乏一贯性的回收卷后, 最终共476份(中国: 240份, 韩国: 236份)为本研究所分析使用。

具体人口社会学特性如下(表1)所见。首先由性别分布来看, 中国男学生占45.4%, 女学生占54.6%; 韩国男学生占30.9%, 女学生占69.1%, 相对来说女学生数量较多。中国学生的学年分布依次为高一(50.0%)、高二(34.4%)、高三(14.6%); 韩国学生的学年分布依次为高一(27.1%)、高二(22.9%)、高三(50.0%), 可见中国高一学生较多而韩国高三学生较多。另从学校成绩来看, 中国学生的成绩分布依次为上(7.1%)、中上(23.3%)、中(40.0%)、中下(19.6%)、下(10.0%); 而韩国学生的成绩分布依次为上(12.2%)、中上(27.8%)、中(33.5%)、中下(16.1%)、下(10.4%)。就家庭条件而言, 认为自己家庭条件一般的中国学生为87.5%占大多数, 其次是认为家庭条件比较富裕的学生6.4%、比较困难的学生5.9%; 而认为自己家庭条件一般的韩国学生为67.2%占大多数, 其次是认为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21.2%、比较富裕的学生11.5%。

此外, 父母学历中, 中国学生的父亲学历分布依次为小学以下(5.8%)、初中(49.2%)、高中(34.2%)、大学以上(10.8%); 韩国学生的父亲学历分布依次为小学以下(3.4%)、初中(7.7%)、高中(43.4%)、大学以上(45.5%), 相对而

9) 考虑到标本分布若过于集中, 易对研究结果的确切度产生影响。故在对两国调查对象所在的学校进行选定时加以区分处理, 即为中国江苏省所在的苏南、苏北地区与韩国大邱·庆北所在的大邱、庆山、庆州、龟尾、荣州等地区, 在区分地区的同时也将经济发展水平、思想保守程度、国际化因素加以结合。

言，中国学生的父亲学历以初中和高中居多，而韩国学生的父亲学历以高中和大学以上居多。中国学生的母亲学历分布依次为小学以下(13.8%)、初中(55.8%)、高中(26.3%)、大学以上(4.2%)；韩国学生的母亲学历分布依次为小学以下(5.2%)、初中(5.6%)、高中(54.5%)、大学以上(34.6%)，相对而言，中国学生的母亲学历以初中居多，而韩国学生的母亲学历以高中居多。接下来看SNS使用程度，相比于中国学生，韩国学生的SNS使用率更为频繁。同样在海外经历上，韩国学生的海外经历(39.4%)远多于中国学生(9.6%)。

〈表 1〉中·韩高中学生一般特性表

区分		中国(N=240)		韩国(N=236)		全体(N=476)	
		N	%	N	%	N	%
性别	男	109	45.4	73	30.9	182	38.2
	女	131	54.6	163	69.1	294	61.8
学年	高一	120	50.0	64	27.1	184	38.7
	高二	85	35.4	54	22.9	139	29.2
	高三	35	14.6	118	50.0	153	32.1
家庭条件	比较困难	14	5.9	50	21.2	64	13.5
	普通	210	87.5	158	67.2	368	77.5
	比较富裕	16	6.4	27	11.5	43	9.1
	无应答	-		1		1	
父亲学历	小学以下	14	5.8	8	3.4	22	4.6
	初中	118	49.2	18	7.7	136	28.6
	高中	82	34.2	102	43.4	184	38.7
	大学以上	26	10.8	107	45.5	133	28.0
	无应答	-		1		1	
母亲学历	小学以下	33	13.8	12	5.2	45	9.6
	初中	134	55.8	13	5.6	147	31.2
	高中	63	26.3	126	54.5	189	40.1
	大学以上	10	4.2	80	34.6	90	19.1
	无应答	-		5		5	
学校成绩	下	24	10.0	24	10.4	48	10.2
	中下	47	19.6	37	16.1	84	17.9
	中	96	40.0	77	33.5	173	36.8
	中上	56	23.3	64	27.8	120	25.5
	上	17	7.1	28	12.2	45	9.6
	无应答	-		6		6	
SNS	经常使用	53	22.1	70	29.7	123	25.8

使用程度	偶尔使用	137	57.1	143	60.6	280	58.8
	不使用	50	20.8	23	9.7	72	15.3
海外经历	有	23	9.6	93	39.4	116	24.4
	无	217	90.4	143	60.6	360	75.6

3.2 测定工具

本研究就中·韩高中学生的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的水准进行观察, 并就国民认同感对多元文化受用性的影响差异展开实证。介于此, 变量的设定即国民认同感为自变量, 多元文化受用性为因变量。此外, 调查对象者的性别、学年、家庭条件、父母学历、学校成绩、SNS使用程度、海外经历等一般特性为外生变量。测定工具具体如下。

3.2.1 国民认同感

国民认同感的测定借助于2003年与2010年由韩国实施的“韩国综合社会调查(Korean General Social Survey : KGSS)”中相关国民认同感的问项(国民资格1~8问项)来进行检测。本研究所使用的测定问项具体为KGSS问项即出生、国籍、长期居住、语言、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与法律、归属感与祖籍等8个问项中, 除去文化传统与归属感两项后, 剩余的6个问项, 各问项均使用“Likert 5分尺度”进行回答, 即分数越高, 其国民认同感程度也就越高。最后, 经Cronbach's α 检验, 中方数据的信度值为 .766, 韩方数据的信度值为 .844。

此外, 为了更好地掌握中·韩高中学生国民认同感间的特性与差异, 本研究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以固有值(eigenvalue) = 1为标准对其进行主成分分析, 其分析结果如下(表2)。

〈表 2〉中·韩高中学生国民认同感的因子分析

	中国		韩国	全体	
	种族认同	公民认同	无法分类	种族认同	公民认同
出生	.862		.800	.879	
祖籍	.763		.748	.782	
国籍	.680		.756	.668	
政治制度·法律		.820	.686		.881
语言		.765	.743		.739
长期居住		.644	.764		.533
eigenvalue	2.792	1.090	3.377	2.964	1.047
说明变量	46.534	18.170	56.288	49.398	17.456
KMO		.759	.821		.783
Cronbach's α		.766	.844		.793

据表可见, 首先, 分析模型的KMO(Kaiser-Meyer-Olkin)值分别为中国方面.759、韩国方面.821、整体.783, 则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强, 非常适合于因子分析的操作。其次, 通过细部观察中国学生的国民认同感可以分为两部分, 即作为第一因子的公民认同感(civic-identity)与作为第二因子的种族认同感(ethnic identity), 其中公民认同感具体由政治制度与法律、长期居住和语言等3个因素所构成, 而种族认同感则由出生、国籍和祖籍等3个因素所构成。而韩国学生的国民认同感虽然无法通过因子分析进行区分, 这意味着韩国学生在种族认同感与公民认同感上的界定比较模糊。该点与前章中以大学生与一般大众为对象并指出“韩国人的国民认同感可以区分为种族与公民两部分”的先行研究有所不符, 本研究仍将其进行分类以便与中国高中学生进行比较分析, 其原因为通过先行研究的考察, 出生、国籍和祖籍等3个方面相对在血统之外难以获得或形成, 故可以将其归类于种族认同感, 而政治制度与法律、长期居住和语言等3个方面相对来说较易获得或形成, 故将其归类于公民认同感。

3.2.2 多元文化受用性

本研究将多元文化受用性的程度以对外国移居者的认知性威胁程度来进行测

定。为了对此(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态度)进行分析,本研究根据并对2005年欧洲人种差别监测中心(EUMC)在进行欧洲指标调查(Eurobarometer Survey)与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中所使用的测定工具进行适当修改以使其应用于高中学生¹⁰⁾。

认知性威胁程度具体由经济、社会、文化等三个层面总6个问项所构成,即在经济层面上对工作机会丧失与福利资源损失两项所认知的威胁,社会层面上对社会问题·犯罪率与抽象的潜在危险性两项所认知的威胁,以及文化层面上文化毁损与优秀的血统毁损两项所认知的威胁。各问项均使用“Likert 5分尺度”进行回答,即分数越高,其多元文化受用性程度反而越低。整体数据经Cronbach's α 信度检验,中方数据的信度值为 .874,韩方数据的信度值为 .861。

3.2.3 外生变数

本研究将调查对象的人口社会学特性,即性别、学年、家庭条件、父母学历、学校成绩、SNS使用程度、海外经历等作为控制变数(性别、SNS使用程度与海外经历作假变因处理¹¹⁾),以便于观测能对中·韩高中学生国民认同感和多元文化受用性间关系产生影响的变数。

3.3 分析处理

本研究将通过问卷调查最终获取的资料通过SPSS统计程序进行分析,并使

10) 欧洲指标调查中包括了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抵抗、多元文化社会的缺陷、针对合法移民者所拥有公民权力的反对、针对合法移民者的遣返政策等指标。而欧洲社会调查中也包含了对多样性的抵抗、对移民者的抵抗、对难民的抵抗、种族距离感、认知性威胁、对犯罪移民者进行遣返等相应指标。上述测定的尺度虽然是为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受用性进行比较研究而开发的,但作为本研究中对中·韩高中学生的多元文化受用性的测定来说,该尺度是非常贴切的(육담성, 정용교, 2014: 315)。

11) 性别为男=1,女=0; SNS使用程度为经常使用=1,偶尔使用与不使用=0; 海外经历为有过=1,没有=0。

用 $\alpha = .05$ 的显著性基准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可信度。为了达到研究目的, 在分析过程中, 首先, 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来对中·韩高中学生的国民认同感进行二次分类以确保研究的效度。其次, 通过频度分析来掌握中·韩高中学生的一般特性及其差异。再次, 使用t-test来对中·韩高中学生的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之间的差异进行检测。最后, 使用多重回归分析来获取能够影响多元文化受用性(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 并对两国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

4. 分析结果及论旨

4.1 中·韩高中学生的国民认同感

下表为针对中·韩高中学生国民认同感间的差异而进行的t-test差异检测分析结果。

〈表 3〉中·韩高中学生的国民认同感差异检测表

区分	中国(N=240)	韩国(N=236)	全体(N=476)	t	
	M(Std.)	M(Std.)	M(Std.)		
种族 认同	出生	2.84(1.29)	3.28(1.21)	3.06(1.27)	-3.85***
	国籍	3.54(1.28)	3.68(1.10)	3.61(1.19)	-1.29
	祖籍	2.82(1.35)	3.00(1.20)	2.91(1.28)	-1.57
公民 认同	长期居住	3.52(1.19)	3.19(1.18)	3.36(1.19)	3.00**
	语言	4.00(1.12)	3.81(1.09)	3.91(1.10)	1.81
	政治制度法律	4.75(.68)	3.78(1.04)	4.27(1.00)	12.07***

** $p < .01$ *** $p < .001$

首先, 两国学生都认为对本国政治制度·法律的尊重、语言的使用能力、国籍所有为相对重要的因素, 相反, 出生、长期居住、祖籍为不太重要的因素。可以看出, 两国学生一致认为在国民认同感中公民认同感(政治制度·法律、语言、

长期居住)的重要程度要高于种族认同感(出生、国籍、祖籍)。这与最近先行研究中提出的“韩国人的公民认同感更高”相符,但与“中国的国民认同感正在向着以种族·血统为中心的变化道路上前行”这一结论并不一致。

其次,两国学生在国民认同感的下位问项中,具有一定的差异。韩国学生对6个问项的重要程度认识依次为语言的使用能力(M:3.81)、对本国政治制度·法律的尊重(M:3.78)、国籍所有(M:3.68)、出生(M:3.28)、长期居住(M:3.19)、祖籍(M:3.00),而中国学生则以对本国政治制度·法律的尊重(M:4.75)、语言的使用能力(M:4.00)、国籍(M:3.54)、长期居住(M:3.52)、出生(M:2.84)、祖籍(M:2.82)为排列。可见中国学生在公民认同感中对政治制度·法律的尊重最为突出,而韩国学生在公民认同感中则以语言的使用能力作为最高基准。

此外,在中·韩高中学生的国民认同感中,出生、长期居住、政治制度·法律等3项具有显著的统计差异。即,韩国学生相较于中国学生对种族认同感中出生($t=-3.85, p<.001$)的重视度更高,相反,中国学生相较于韩国学生则认为公民认同感中长期居住($t=3.00, p<.01$)与政治制度·法律($t=12.07, p<.001$)的重要性更强。故由此可以推出,韩国学生相较于中国学生,其种族认同感更为强烈,而中国学生相较于韩国学生,其公民认同感更胜一筹。这个结果与以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先行研究中所提出的“韩国大学生的国民认同感较中国大学生更具有公民性的一面”一说有所差异。

4.2 中·韩高中学生的多元文化受用性

下列(表4)为针对中·韩高中学生多元文化受用性间的差异而进行的t-test分析结果。总的来看,两国高中学生对外国移住民的认知性威胁程度并非很高,问项中出现的最高值为3.01(中国),而韩国学生的最高值仅为3.00。

具体观察,韩国学生在“外国移住民会导致国内社会问题或犯罪率的增加”这一

项中展现的数值最高(M: 3.00), 而在“外国移住民会导致韩国文化受到毁损”这一项中展现的数值最低(M: 2.59), 从而说明韩国高中学生认为外国移住民的流入将对韩国的社会治安与稳定造成威胁, 但并不担心其会对韩国文化造成毁损。再看中国学生在“外国移住民会导致中国文化受到毁损”这一项中展现的数值最高(M: 3.01), 而在“外国移住民会导致国民福利资源损失”这一项中展现的数值最低(M: 2.39), 从而说明中国高中学生认为外国移住民的流入将对中国的文化完整性造成威胁, 但并不担心其会对国民所享受的福利资源造成负面影响。

〈表 4〉中·韩高中学生的多元文化受用性差异检测表

区分	中国(N=240)	韩国(N=236)	全体(N=476)	t	
	M(Std.)	M(Std.)	M(Std.)		
经济					
	工作机会丧失	2.96(.93)	2.68(.97)	2.82(.96)	3.27***
	福利资源损失	2.39(.90)	2.71(1.00)	2.55(.96)	-3.63***
社会					
	社会问题·犯罪率	2.59(.92)	3.00(1.02)	2.79(.99)	-4.64***
	潜在危险性	2.50(.98)	2.88(1.10)	2.69(1.06)	-4.04***
文化					
	文化毁损	3.01(.93)	2.59(1.01)	2.80(.99)	4.77***
	血统毁损	2.41(1.00)	2.65(1.14)	2.53(1.08)	-2.40*

* $p < .05$ *** $p < .001$

另外, 中·韩高中学生认知性威胁程度的6个项目全都具有显著的统计差异。特别是韩国高中学生的认知性威胁程度中有4项超过了中国高中学生, 分别为福利资源损失($t = -3.63, p < .001$)、社会问题·犯罪率($t = -4.64, p < .001$)、潜在危险性($t = -4.04, p < .001$)与血统毁损($t = -2.40, p < .05$)。而中国高中学生仅在工作机会丧失($t = 3.27, p < .001$)与本国文化毁损($t = 4.77, p < .001$)等2项上高于韩国高中学生。换句话说, 对于外国移住民流入的这一现象, 韩国学生更为担心的是本国国民福利资源损失、社会问题·犯罪率的增大、潜在危险性的上升与对自身民族血统的毁损, 而中国学生则更为担心工作机会的丧失与是否会对本国文化造成毁损。

4.3 国民认同感对多元文化受用性产生的影响

4.3.1 多元文化在经济层面的认知性威胁

下表为影响中·韩高中学生对多元文化产生认知性经济威胁的因素进行多重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 5〉中·韩高中学生的多元文化认知性经济威胁影响分析表

		多元文化认知性经济威胁			
		中国		韩国	
		B (S.E.)	β	B (S.E.)	β
控制 变 数	(常数)	1.778 (.487)		1.912 (.457)	
	性别(1=男)	.213 (.101)	.136*	.052 (.124)	.029
	学年	.023 (.069)	.021	.142 (.068)	.145*
	家庭条件	-.110 (.096)	-.076	-.005 (.096)	-.004
	父亲学历	-.065 (.070)	-.067	.216 (.095)	.219*
	母亲学历	.083 (.073)	.084	-.135 (.099)	-.133
	学校成绩	.065 (.048)	.089	-.017 (.053)	-.024
	SNS使用程度(1=经常)	-.063 (.121)	-.034	-.159 (.122)	-.087
	海外经历(1=有)	.140 (.172)	.053	.080 (.123)	.047
	种族认同感	.194 (.062)	.250**	.314 (.069)	.387** *
公民认同感	.065 (.079)	.65	-.227 (.080)	-.239* *	
R^2		.119		.128	
F		3.087**		3.123**	

* $p < .05$ ** $p < .01$ *** $p < .001$

首先可以看出,造成韩国学生对多元文化产生认知性经济威胁的主要因素为学年($\beta = .145$, $p < .05$)、种族认同感($\beta = .387$, $p < .001$)与公民认同感($\beta = -.239$, $p < .01$),该分析结果的说明力为12.8%($p < .01$)。即,韩国高中学生中,学年越高、种族认同感程度越高、公民认同感程度越低的话,其对多元文化所产生认知性经济威胁也就越深刻。

其次,造成中国学生对多元文化产生认知性经济威胁的主要因素为性别(β

= .136, $p < .05$) 与种族认同感($\beta = .250$, $p < .01$), 该分析结果的说明力为 11.9% ($p < .01$)。即, 中国高中学生中, 男学生相较于女学生对多元文化所产生的认知性经济威胁更大, 另外, 种族认同感程度越高, 其对多元文化所产生认知性经济威胁也就越深刻。由此看来, 此处中·韩两国学生最大的差异之处在于中国学生的公民认同感无法对多元文化所产生认知性经济威胁造成影响。

4.3.2 多元文化在社会层面的认知性威胁

下表为影响中·韩高中学生对多元文化产生认知性社会威胁的因素进行多重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 6〉中·韩高中学生的多元文化认知性社会威胁影响分析表

		多元文化认知性社会威胁			
		中国		韩国	
		B (S.E.)	β	B (S.E.)	β
控制 变数	(常数)	1.804 (.532)		2.297 (.546)	
	性别(1=男)	.401 (.111)	.231***	-.263 (.148)	-.124
	学年	-.026 (.076)	-.022	.066 (.081)	.058
	家庭条件	-.173 (.105)	-.107	.236 (.115)	.162*
	父亲学历	-.108 (.077)	-.101	.096 (.113)	.083
	母亲学历	.163 (.080)	.149*	-.187 (.119)	-.156
	学校成绩	.007 (.053)	.009	.030 (.063)	.035
	SNS使用程度(1=经常)	.041 (.132)	.020	-.088 (.146)	-.041
	海外经历(1=有)	.066 (.188)	.023	.083 (.146)	.041
	种族认同感	.168 (.068)	.194*	.244 (.082)	.256**
	公民认同感	.103 (.086)	.092	-.168 (.096)	-.150
	R^2		.147		.099
F		3.932***		2.346*	

* $p < .05$ ** $p < .01$ *** $p < .001$

首先能够看出, 造成韩国学生对多元文化产生认知性社会威胁的主要因素为家庭条件($\beta = .162$, $p < .05$)与种族认同感($\beta = .256$, $p < .01$), 该分析结果的说明力较低为9.9% ($p < .05$)。即, 韩国高中学生中, 家庭条件越优越、种族认同感

程度越高, 其对多元文化所产生认知性社会威胁也就越深刻。

其次, 造成中国学生对多元文化产生认知性社会威胁的主要因素为性别($\beta = .231, p < .001$)、母亲学历($\beta = .149, p < .05$)与种族认同感($\beta = .194, p < .05$), 该分析结果的说明力为14.7%($p < .001$)。即, 中国高中学生中, 男学生相较于女学生对多元文化所产生的认知性社会威胁更大, 另外, 中国学生母亲学历越高、种族认同感程度越高, 其对多元文化所产生认知性社会威胁也就越深刻。由此看来, 此处中·韩两国学生国民认同感中的公民认同感都无法对多元文化所产生认知性社会威胁造成影响。

4.3.3 多元文化在文化层面的认知性威胁

下表为影响中·韩高中学生对多元文化产生认知性文化威胁的因素进行多重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 7〉中·韩高中学生的多元文化认知性文化威胁影响分析表

		多元文化认知性文化威胁			
		中国		韩国	
		B (S.E.)	β	B (S.E.)	β
控制 变数	(常数)	1.356 (.492)		1.827 (.523)	
	性别(1=男)	.342 (.102)	.214***	-.048 (.142)	-.023
	学年	-.036 (.070)	-.033	.082 (.077)	.074
	家庭条件	.053 (.097)	.035	.158 (.110)	.112
	父亲学历	-.070 (.071)	-.070	.062 (.108)	.055
	母亲学历	.008 (.074)	.008	-.045 (.114)	-.039
	学校成绩	.048 (.049)	.063	-.065 (.060)	-.079
	SNS使用程度(1=经常)	.067 (.122)	.035	-.094 (.140)	-.045
	海外经历(1=有)	.170 (.174)	.063	.184 (.140)	.095
	种族认同感	.164 (.062)	.206**	.366 (.078)	.395***
	公民认同感	.158 (.080)	.153*	-.250 (.092)	-.231**
R^2		.145		.123	
F		3.882***		2.988**	

* $p < .05$ ** $p < .01$ *** $p < .001$

首先可以得出，造成韩国学生对多元文化产生认知性文化威胁的主要因素为种族认同感($\beta = .395, p < .001$)与公民认同感($\beta = -.231, p < .01$)，该分析结果的说明力为12.3%($p < .01$)。即，韩国高中学生中，种族认同感程度越高、公民认同感程度越低，其对多元文化所产生认知性文化威胁也就越深刻。

其次，造成中国学生对多元文化产生认知性社会威胁的主要因素为性别($\beta = .214, p < .001$)、种族认同感($\beta = .206, p < .01$)与公民认同感($\beta = .153, p < .05$)，该分析结果的说明力为14.5%($p < .001$)。即，中国高中学生中，男学生相较于女学生对多元文化所产生的认知性文化威胁更大，另外，种族认同感与公民认同感的程度越高，其对多元文化所产生认知性经济威胁也就越深刻。此外，中·韩两国学生最大的差异之处在于中国学生的公民认同感对多元文化所产生认知性文化威胁呈正相关，而韩国学生的公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认知性文化威胁呈负相关。

5. 结论及展望

与欧洲诸国相比，中·韩两国的多元文化社会还正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试想今后，随着近来外国人流入现象的快速增加，可以预测这样的趋势在日后也将更进一步得到加深，从而使中·韩两国相比于其他国家更有可能受到多元文化影响而产生诸多的社会问题。故为了社会的统合与维稳，针对多文化对策的摸索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这一点，本研究以中·韩高中学生为中心，对其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步骤为首先对两国学生国民认同感间的差异进行研究，其次对双方多元文化受用性间的差异进行研究，最后为对双方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之间关系的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具体如下。

第一，通过对中·韩两国高中学生在国民认同感上的比较可以得出其共同点

和差异点同时存在,两国学生一致认为相对于种族认同感,公民认同感更为重要。对于韩国学生,这一结论与先行研究相符,但对于中国学生,这一结论与韩国国内的先行研究不一致。从而得出,两国学生在20岁之前就已经形成相较于种族认同感、公民认同感更高的国民认同感的这一事实。此外,中·韩两国高中学生在国民认同感差异点为韩国学生对种族认同感的认识要高于中国学生,但对公民认同感上的认识却远不足于中国学生。中国作为历经革命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其国民的公民认同感自然更胜一筹(Brubaker, 1992: 14)。而对韩国学生种族认同感偏高的这一现象可以判断为,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其民族中心的教育理念仍持续对学生们造成着影响。

第二,为了对中·韩两国高中学生在多元文化受用性上的差异进行比较,使用其对外国移住民的认知性威胁程度来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中也同时出现了共同点和差异点。共同点为两国学生对外国移住民的认知性威胁程度并非很高,大部分问项的回答都低于均值(M: 3.00),韩国学生高于均值的选项为社会问题·犯罪率,而中国学生高于均值的选项为文化毁损。此外,差异点为两国学生在不同问项上的回答有着较大的差别,韩国学生在福利资源损失、社会问题·犯罪率、潜在危险性与血统毁损等问项上的威胁认识程度相对较高,而中国学生仅在工作机会丧失与文化毁损两个问项上的威胁认识程度相对较高。即,韩国学生最担心的是多元文化的流入会造成本国社会问题·犯罪率的增大,但并不担心其会对韩国文化造成毁损。而中国学生最担心的是多元文化是否会对本国文化造成毁损,相反并不担心其会对国民所享受的福利资源造成负面影响。

第三,通过对中·韩两国高中学生在国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之间关系的比较可以得出,韩国学生的种族认同感与公民认同感共同对多元文化受用性产生影响,而中国学生仅在种族认同感上对多元文化受用性产生影响。即,韩国学生的种族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经济、社会、文化)之间呈负相关,而公民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经济、文化)之间呈正相关;中国学生的种族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经济、社会、文化)之间呈负相关,而公民认同感仅能对文化层面的多元文化受用性产生正面的影响,在经济及社会层面上却无显著的意义。通过

这样的结论可以得出，种族认同感能对多元文化受用性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而公民认同感在部分方面则能对多元文化受用性产生积极正面的效应，同时也与先行研究中的结果相一致。

通过对上述研究结果的审察，下列为本文的研究意义与不足之处。首先，对于国民认同感的内部区分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本研究中，中国学生的国民认同感可以区分种族认同感和公民认同感两类，而韩国学生的国民认同感无法进行区分。这样的结论与先行研究中所指出的“韩国人的国民认同感可以进行区分，而中国或他国人民的国民认同感无法进行区分”这一说法不符，故需要对其进行严谨地梳理。其次，通过本研究可以对中·韩两国未来将呈出何种多元文化社会模式进行展望。两国学生对多元文化的认知性威胁程度相对较低，由此可见其多元文化受用性相对较高，这对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中·韩两国来说，算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信息。不过，依然能发现种族认同感与多元文化受用性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故可得出两国在今后的多元文化教育上，应该及时避开以种族认同感为中心的教育误区的这点启示。再次，两国学生中对认知性威胁产生影响的因素也有所差异，故可得出政府机关应使用符合各国国情的多元文化政策的这一点启示。另外，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民族认同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团结都起着积极的作用，故在提倡多元文化共存的同时，既要避免本国民族主义产生消极作用，又应对其进行本质性的维持。留意和引导媒体的相关舆论，尽量避免文化认知问题政治化，从而真正达到多元文化共存的良好局面。最后，在本研究进行中，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无法进行完整的实地调查以至于调查对象的学年特性与性别特性无法得到均衡，故在今后将作出进一步的完善以达到研究的严谨性。

< 參考文獻 >

- 강원택(2006), <한국인의 국가정체성과 민족정체성: 대한민국 민족주의>, 《한국인의 국가정체성과 한국정치》, 동아시아연구원, 15-38.
- 권혁범(2009), 《민족주의는 죄악인가》, 서울: 생각의 나무.
- 기획재정부(2011), <2040년 한국의 삶의 질>, 성균관대학교 하이브리드컬처연구소.
- 김경은(2012), <청소년의 국민정체성, 통일, 다문화수용성에 대한 인식-다문화시대 사회와 통일교육의 함의>, 《사회과교육》 51(1), 123-140.
- 김현선(2006), <국민, 반국민, 비국민-국민형성의 원리와 과정>, 《사회연구》 12(2), 77-106.
- 김현숙 · 최송식 · 김희재(2011), <국민정체성과 다문화태도의 관계: 한 · 중 · 일 대학생 중심으로>, 《국제지역연구》 15(2), 141-168.
- 김희재 · 김현숙(2012), <한국과 일본 대학생의 국민정체성과 다문화태도>, 《동북아 문화연구》 33, 83-104.
- 맹진학(2009), <한국인의 다문화 배제 태도에 영향을 주는 결정 요인에 관한 다층분석>, 《사회복지정책》 36(3), 323-348.
- 박병구(2007), <현대의 민족문제와 다문화주의: 중국 다문화주의의 실태와 문제점>, 《민족연구》 30, 196-211.
- 손영기 · 이정향(2013), <중국민족구역자치법의 주요내용과 문제점>, 《가천법학》 6(1), 461-488.
- 양계민(2009), <한민족정체성과 자민족중심주의가 청소년의 다문화수용성에 미치는 영향>, 《한국청소년연구》 20(4), 387-421.
- 육담성 · 정용교(2014), <中國高中學生多文化意識與態度相關研究>, 《동아인문학》 27, 309-335.
- 윤인진 외(2010), 《한국인의 이주노동자와 다문화사회에 대한 인식》, 서울: 이담북스.
- 윤인진 · 송영호(2011), <한국인의 국민정체성 에 대한 인식과 다문화수용성>, 《통일 문제연구》 55, 143-192.
- 이래호(2009), <중국의 외국인 관리제도와 한국인 장기체류자의 적응상태분석>, 박사 학위논문, 한양대학교.
- 조경란(2006), <현대 중국의 소수민족에 대한 '국민화' 이데올로기: 중화민족론을 중심으로>, 《시대와 철학》 17(3), 65-85.
- 최현(2003), <대한민국과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국민정체성과 시민권제도>, 《한국사회

학》 37(4), 143-173.

최현(2007), <한국인의 다문화 시티즌십: 다문화 의식을 중심으로>, 《시민사회와 NGO》 5(2), 147-173.

통계청(2014), <출입국외국인정책통계연보>.

황정미 외(2007), <한국사회의 다민족·다문화 지향성에 대한 조사연구>, 한국여성정책연구원.

황정미(2010), <한국인의 다문화 수용성 분석: 새로운 성원권의 정치학 관점에서>, 《아세아연구》 53(4), 152-184.

王晓玲(2012), <中韩民众间的相互认识以及好感度影响因素>, 《동아연구》 31(2), 83-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北京: 中国法治出版社.

Brubaker R.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U Monitoring Center for Racism and Xenophobia: EUMC (2005), Majorities' Attitude Toward Minorities: Key Findings from the Eurobarometer and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EUMC (2006), Attitude Toward Minorities: Key Finding from the Eurobarometer and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MO (2012),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1.

Jones, F.L., & Smith, P. (2001),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Bas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 Comparative Multi-Level Analysi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7(2), pp.103-118.

Maddens B., Billiet J., & Beerten R. (2000),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attitude towards foreigners in multi-national states: the case of Belgiu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6(1), pp.45-60.

Pettigrew T. (2003), "People under threat: Americans, Arabs, and Israelis",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9(1), pp.69-90.

Raijman R., & Semyonov M. (2004), "Perceived Threat and Exclusionary Attitudes Towards Foreign Workers in Israel",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7(5), pp.780-799.

Scheepers P., Gijsberts M., & Coenders M. (2002), "Ethnic Exclusionism in

European Countries: Public Opposition to Civil Rights for Legal Migrants as a Response to Perceived Ethnic Threat”,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1), pp.17-34.

Simon J., & Lynch P. (1999),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Public Opinion toward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3(2), pp.455-467.

Tajfel H., & Turner 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 Worchel & W. G.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2nd ed., Chicago: Nelson-Hall, pp.7-24.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Civic Identity, and Multicultural Acceptability of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outh Korea and China. For this purpose, a survey questionnaire was given to 476 students from four high schools located in Jiang-Su Province of China(240 people) and seven high schools located in Daegu-Gyeongbuk Region of Korea(236 people).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through SPSS 22.0 which applied factor analysis, frequency analysis, t-test,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ly, civic identity of Chinese and Korean students was higher compared to ethnic identity. In the Korean students case, their ethnic identity tended to be higher. And Chinese students tend to consider civic identity as a important related thing more strongly than Korean students. Secondly, ethnic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and Korean student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ulticultural acceptability, and civic identity of the Korean students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multicultural acceptability, but civic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was didn't have correlation with it.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suggest many prospective research

topics to be investigat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national identity, ethnic identity, civic identity, multicultural acceptability, perceived threat, comparative study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5. 6. 9.	2015. 7. 16.	2015. 7. 21.	2015. 7. 31.	2015. 8. 31.